

## 《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新探

乔根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具有表层和深层两种不同的模式:从表层结构视之,它是“纪传体结构”;从深层结构视之,则是“阴阳共生的太极图式”。

**关键词:**《儒林外史》;叙事结构;表层;深层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6-0067-04

—

《儒林外史》叙事结构问题是《儒林外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众说纷纭、歧义纷出的一个问题。对《儒林外史》结构的研究,“经历了由其结构形态是什么,形态的价值判断(20世纪前20年);多样的理论阐释(中间60余年);再逐渐走向超越价值判断的原因分析,以便从根源上理解、把握其特征(最后10余年)三个阶段”。<sup>[1]425</sup>

最早一眼看出《儒林外史》结构特点的是胡适,胡适多次批评《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好,并且认为对后来的谴责小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鲁迅对《儒林外史》结构批评认识与胡相同,只不过语言更为委婉,其中“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云云对后世批评者影响较大。至50年代,吴组缃提出“连环短篇”实是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个例子。海外也有研究者如乐蘅军、郑明俐、夏志清、H.C.Chang、林顺夫等认为《儒林外史》有独特的结构,并提出了“涡轮式结构”、“连环画式结构”等看法。<sup>[2]74-83</sup>也有学者继承胡适、鲁迅的看法,认为《儒林外史》结构松散,但描写成就较高,如姚雪垠、冯至等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判大致有两种:第一种是肯定论,认为是一种

创新,代表人物是黄秉泽、陈美林等人,认为《儒林外史》结构并不松散,全书有一条主线,即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采用这样的结构是为“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第二种态度是既肯定又否定,代表人物是吴圣昔等人,他们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模式是一种创新,但也可能有某种不足,其艺术结构的松散感正是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对此加以无限夸大和无限否定,固然不当,无视和掩盖也未免欠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界的思考更为理性和成熟。其中杨义和张锦池的文章尤为重要。杨义在其长文《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中,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是百年反思的“叶子”式长篇结构体制。<sup>[3]447-477</sup>张锦池在回顾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暗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外在特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给他起个名目,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sup>[4]347-348</sup>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用王冕“二十四幅花卉册页”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认为这二十四幅花卉册页由头、身、尾三部分组成,并具有“时间性、逻辑性、层次性、对照性、条贯性等五个特点”,同时认为这种结构是一个

收稿日期:2007-11-13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院级课题“《儒林外史》叙事研究”(2005ysk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乔根(1976-),安徽桐城人,黄山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

创造。<sup>[6]</sup>其他关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成果,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及。

## 二

“结构”一词在东西方语境中各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在西方学者尤其是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可以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无须作过多分析,深层结构是潜藏在作品群中的模式,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用抽象手段,把模式找出来。他们反对对外界的一切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闭的自足体。<sup>[6]71</sup>而在中国古代评点家看来,“结构”一词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结构’一词,在中国语言中最早是一个动词,‘结’就是结绳,‘构’就是架屋。把它组合成词的时候,《抱朴子·勖学》篇云:‘文梓干云而不可名台榭者,未加班轮之故也。’这里的‘结构’依然是动词,或动词的名词化;而且它的重心在‘构’字,和盖房子有关系。以后中国人谈论文章结构的时候,也常常联想到盖房屋,或者房屋结构……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经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的叙事学贡献自己的智慧的一个重要命题。”<sup>[7]4-35</sup>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心目中的“结构”与传统文论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叙事作品的结构的时候,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中的过程。那种把结构冷漠地视为机械组合体,而可以随便分割和编配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叙事结构的生命过程了。任何结构如果包含着生命投入,都不应该视为凝止的,而应该是带动态性的。寻找‘结构’一词在语源上的动词性,实际上乃是寻找结构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sup>[7]4-35</sup>

20世纪学界对《儒林外史》结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如果依照上述中西方关于“结构”一词的不同理解,会发现20世纪学界在《儒林外史》结构研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和误区。这些学者要么漠视中西方在“结构”一词上的不同理解,以西衡中,削足适履,努力以西方语境来解读《儒林外史》的独特结构;要么先扬后抑,肯定《儒林外史》文学描写上的成就,否定《儒林外史》结构上的成就,斥之为“松散”。应该看到,虽然“以西方现当代文论为视角重

新闻释和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新时期以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中一支延绵不断的思潮,这些新的理论视角拓展和丰富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空间和维度,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自是功不可没。然而,西方现当代文论毕竟源于西方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其问题的提出、命题的确定、概念范畴的使用都有着特定的文化、文学背景,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本身的命题、本体特性之间存在着理论视角的错位。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西方现代文论的运用绝不能代替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考察,也绝不能代替孕育古典文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视角。所以,以西方现当代小说叙事学的结构观来重新阐释《儒林外史》虽然得出了一些肯定性的结论,但其理论视角本质上依然属于西方视域,并未回归中国小说文体之文化本体。”<sup>[8]4</sup>

因此,应该将《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放在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小说文体观念视角的具体语境中进行考察。

## 三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看到了《儒林外史》结构的“缀段性”特点。也就是说,“《儒林外史》并非独一无二地不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事实上,所有中国传统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由松松散散地连在一起的片段缀合而成的情节特性。这一现象同宋元时期说书人传统习惯的影响有关,也同早期中国小说的铺陈衍生的性质有关。归根结底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有关,和其他许多民族不同,中国人颇为独特地相信宇宙和宇宙中的人并非被一种外部力量或终极原因所创造。相反地,他们把宇宙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我发生的、能动的过程,他们的各个部分在一个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中相互作用。人则被认为参与了宇宙的创造过程,构成天、人、地的三合一。这种自存宇宙的以人为中心的、有机体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影响。”<sup>[9]</sup>换言之,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天人合一”,“阴阳共生”。《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研究叙事作品的结构应该从两个角度去分析: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就《儒林外史》的结构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张锦池先生的观点,认为是“纪传性结构形态”,这是它的外部形态,或者称之为表层结构,这一点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另一方面,应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层结构来探索分析其内在的深层结构。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具体到《儒林外史》文本本身,按照常见的结构划分,《儒林外史》可以分为3大部分:第1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是小说的开头部分,可以算作《王冕传》,借助王冕这一理想知识分子形象为后代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标尺。中间的主体部分从第2回到54回,主要内容就是闲斋老人所说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这句话。在“功名富贵”的旗帜下,串连起一个又一个故事:周进、范进故事(第2回至第4回);严贡生、严监生故事(第5回至第6回);王惠故事(第7回至第8回);娄氏兄弟故事(第8回至第12回),包括了杨执中、权勿用等人的传奇;蘧公孙故事(第10回、第11回及第13回);马纯上故事(第14回、第15回);匡超人故事(第15回至20回);牛浦郎故事(第20回由牛布衣引出,第21回至24回,牛浦郎成了牛布衣的顶替者);鲍文卿、鲍廷玺故事(24回至27回,中间又附了戏曲作家兼官员向鼎故事);季苇萧、季恬逸、萧金铉故事(第28回);杜慎卿故事(第29回至30回);杜少卿故事(第31回至37回);庄绍光故事(第34回至37回);虞博士故事(第36回至37回);郭孝子故事(第37回至38回,并了结王惠故事);萧云仙故事(第39回至第40回,中间夹有平少保故事);沈琼枝故事(第40回至41回);汤奏故事(第42回至44回及46回一部分);余有达、余有重故事(第44回至45回及48回部分);虞华轩故事(第46回至47回);王玉辉故事(第48回);万青云、凤鸣岐故事(第49回至52回);陈木南故事(第53回至54回,并有聘娘故事)。这些各色人物故事的间隙,还穿插写了几次大的文人活动:莺豆湖名士游园晚会、西湖诗会、莫愁湖风流高会、祭泰伯祠大典。此外,还写了几次战役:青枫城战役、野羊塘战役。写这些实际上也是作者“礼乐兵农”思想的体现。小说的结尾部分即第55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和第56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一为从“市井中间”探索未来,写市井奇

人,一为借“幽榜”重新罗列人才,与“楔子”形成互补。

对《儒林外史》的文本进行认真解读就会发现,“有两个意象对《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起贯穿作用,体现出《儒林外史》创作的阶段性和有机整体性,体现出《儒林外史》作为思想文化小说的另一面即诗性小说的浓郁抒情言志色彩。一为代表山林文化的江湖意象,一为代表庙堂文化的祠庙意象。”<sup>[10]</sup>在《儒林外史》的前半部分,江湖意象频繁出现,如“七泖湖”、“莺豆湖”、“西湖”、“莫愁湖”等。这些湖意象“在象征隐逸的山林文化系统中,是士子的精神栖隐地。它既表现主体漂泊无定、投闲置散、落魄失意的生活态势和情绪态势,更体现主体避世隐逸、独善其身、自由高蹈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还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生存环境的不满与否定等因素。”自36回起,江湖意象让位于祠庙意象,尤其以“泰伯祠”为重中之重。这种转换不但体现了作者创作宗旨的转换,“他从讽世转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而且也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儒林外史》后半部分的叙事结构诟病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夏志清先生,他认为:“(《儒林外史》)第3部分(第37回至54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1和第2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事长官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sup>[11]</sup>如果单从人物性格角度去看(包括反面人物),其人物性格都不鲜明,但若深入下去,也就是从上文中提到的两个代表性的意象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文本老人创作《儒林外史》时大有深意所在:“小说上半部分(36回以前)重在以内圣、以人格烛照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灵魂,揭露士子人格的受摧残、人才的受扼杀,并推出理想人格真儒名士;下半部分即重在以外王、以事功标示社会理想、揭示政事世风,写真儒名士企图用礼乐兵农对社会进行拯救,由拯救无效而至薄俗浇漓世风日下。《儒林外史》的创作构思由人格关怀向社会关怀转换,故后部分也写了不少贤人,但其意已不在高标某种人格(故包括反面人物,其人物性格都不鲜明),而在借此反省士风、政事、治平、民命,贤人与世运相陵替,以见一代兴衰与制度人才的互动关系。两构思相辅

相成,浑然一体。”换言之,“可以把《儒林外史》的内在结构比作太极图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对立统一。以江湖意象与祠庙意象而言:前者作为象征树立一种人格理想,烛照八股科举制度下种种人的心术世相,骂世实为救世,冷中有热,如阴中有阳,处于其顶峰的真儒名士为救世而建泰伯祠。后者作为象征确立一种社会理想,以礼乐兵农为救世良药,而报国无门,贤人与世运相陵替,热中有冷,如阳中有阴,救世实为叹世,无奈之极仍回归人格独立以葆其天真。”

因此,就《儒林外史》而言,从表层结构视之,它是“纪传体结构”;从深层结构视之,则是“阴阳共生的太极图式”。

#### 参考文献:

[1]黄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 [2]连心达.欧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评价[J].明清小说研究,1997,(1).
- [3]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M]//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张锦池.论《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C]//山东人民出版社.名家解读儒林外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 [5]苏建新,刘垣.二十四幅花卉册页《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J].孝感学院学报,2000,(3).
- [6]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8]王庆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误区[J].中文自学指导,2004,(6).
- [9]林顺夫.小说结构与中国宇宙观[C]//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0]刘汉光.《儒林外史》的意象式结构——以江湖与祠庙为中心[J].学术研究,2001,(6).
- [11]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曲晓红

##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cholars"

Qiao Ge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cholar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novel is characterized by a double-lay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a surface level and a deep one, among which, the former is more like that of a "general historical study" while the latter forms a Tai Ji schema featured by harmony of Yin and Yang

**Key words:** "The Scholars"; narrative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deep structure

#### ·徽州文化小资料·

### 连科三殿撰 十里四翰林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状元黄轩是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状元金榜是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状元吴锡龄又是休宁人。接连三科状元俱为徽州儒生所得,颇不寻常。

同治十年(1871年)梁耀枢榜洪斌、郑成章、黄家悝、汪运轮四人同科考中进士,俱授庶吉士。四人皆属歙县西乡人,他们的家乡岩镇、郑村、潭渡、西溪南四村镇都在丰乐河畔,相距仅10余里。如此相近的同乡四人同榜高中,俱归翰林,诚为罕见。遂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科举佳话流传。